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 抗战音乐的救亡和启蒙

■李诗原

抗战音乐凝成一个救亡主题，慷慨激昂，英勇悲壮，坚强厚重，贯穿14年的抗战历程。在沈阳北大营，在上海吴淞口，日本侵略者燃起战火，也点燃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怒火和激情，使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再次被激发出来，于是便有了抗战音乐。从《抗敌歌》《吊吴淞》到《义勇军进行曲》，从《大刀进行曲》到《游击队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从《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到《黄河大合唱》以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音乐，抗战的歌声响彻长城内外，响彻大江南北，一个依托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救亡主题得以呈示、展开、变奏，最终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再造、重现，汇成巨澜，达到高潮。正是这个救亡主题，使抗战音乐成为20世纪中国音乐的壮丽乐章。

抗战音乐也蕴含着一个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启蒙主题。它使身处战火中的人们，仍能通过音乐感受到个体的光芒和力量，感受到个性解放和心灵的自由。正是在抗战歌声的感召下，无数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民族被践踏和蹂躏时的切肤之痛，进而意识到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认识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最终在进步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团结抗争与投降卖国之间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这就是抗战音乐的启蒙。这是一种更为深邃、厚重的思想主题，作为一种来自音乐的人文关怀，已不仅仅是那种旨在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启蒙，而且还是一种以新民主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现代启蒙。尤其是左翼抗战音乐和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作为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更是一种以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为初心和旨归的启蒙。由此可见，救亡并未耽误启蒙，而且推动了启蒙；或者说启蒙伴随着救亡，启蒙寓于救亡。于是，救亡与启蒙成为抗战音乐中两种相得益彰的精神力量。对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这种寓于抗战音乐的救亡和启蒙具有同等地位，不仅在抗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还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如同《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将永远不会过时，并将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的确，相对于抗战音乐的救亡，其启蒙意识是隐含的、深邃的，被救亡这一宏大叙事所遮蔽，不大容易被觉察。在国统区的抗战音乐中，如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的《抗敌歌》《旗正飘飘》《冲锋号》《吊吴淞》，华北事变后的《松花江上》，卢沟桥事变后的《长城谣》《大刀进行曲》，淞沪会战后的《歌八百壮士》及1938年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心转移到武汉、桂林后的《故乡》《嘉陵江上》，都发出了救亡的呼声，凝成了救亡的主题，但同时也充分表达出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所以启蒙意识显而易见。尤其是《松花江上》，它告诉全体东北军官兵，其父老妻儿正在遭受日寇铁蹄的蹂躏和践踏。正是这浓厚的家国情怀，打动了在西北与红军作战的张学良部官兵，为红军与张学良部、杨虎城部之间的停火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部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启蒙意识毋庸置疑。

再看左翼抗战音乐和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其救亡意识与生俱来。这在早期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游击队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黄河大合唱》以及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及东北抗日联军音乐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作为世纪经典的《黄河大合唱》，用黄河象征中华民族，用黄河的宏大气魄象征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用黄河奔流不息、勇往直前的气势激励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团结一心、抵抗外敌，救亡图存，将全民族的救亡意识诉诸母亲河的巨澜和怒涛。左翼抗战音乐和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中的启蒙意识同样可贵，更不容忽视。比如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启蒙意识和救亡意识一样强烈，特别是歌词，作为让四万万同胞猛醒的警句，提醒处在民族危亡之际的人们，如果你不愿做亡国奴，那就起来去战斗吧。再如，《黄河大合唱》的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以船夫历经艰险到达彼岸来象征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接着是“时代歌手”对黄河的赞颂、“民族诗人”对黄河的呼唤，使人置身于史诗般的艺术境界。在这番诗意的、理想主义式的表达后，音乐将人们带回到严酷的现实中，从黄河东岸一片凄凉的叙述到两个流亡者的对话，再到一位妇人的悲惨控诉和她不堪忍受耻辱的投河自尽，将一种巨大的苦难和悲痛呈现在人们面前。最后，音乐进入幻想和诗意的境界，在激情澎湃和热血沸腾中对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作了展望。在这种极富艺术感染力的艺术表达中，蕴含着强烈的启蒙意识。尤其是流亡者的对话和妇人的投河，都旨在启迪和唤醒广大民众。这里还要特别提及，那些旨在加强根据地民主建设的音乐，如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减租会》《惯匪周子山》及歌剧《白毛女》作为一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更具有启蒙意识，其中的改造“二流子”、开展识字运动、减租减息、破除迷信、清匪反霸、斗地主的内容和情节，都在宣传抗战、表达救亡主题的过程中，将艺术视角指向了人，并对人的自身发展及其生存状态的改善给予充分关注。

尤其是《白毛女》“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思想主题，说到底就是一个启蒙的主题，并对个体命运给予了深刻的同情。1947年，马思聪在《新音乐的新阶段》一文中说：“在抗战中年轻人是多多少少借着歌声的号召而把力量贡献于祖国的，一直到目前，这歌声还在继续号召年轻人向恶势力搏斗，向光明前进，向正义看齐。这一切是新音乐的贡献，是它的成绩。”显然，这里的新音乐主要就是左翼抗战音乐和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这里对新音乐的赞美也主要是对其启蒙意识的肯定和认同。

但是抗战音乐的启蒙意义，一直未能得到充分重视，甚至还有一种观点将救亡与启蒙对立起来，认为抗战音乐只在于救亡，而阻滞了自鸦片战争以降的那种启蒙。之所以存在这种认识，就在于未能从源头上看清救亡与启蒙在近代中国与生俱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二者同时共在，互为前提，相得益彰，不能仅对启蒙作出一种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狭义理解。当然，这种认识也来自音乐理论界人为设置的那种二元对立——所谓救亡派与学院派的博弈。于是便形成这样一种认识：救亡派旨在救亡，而放逐了启蒙；学院派承续了五四，虽也不乏救亡，但重在启蒙；较之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启蒙，救亡作为一种革命，又似乎显得微不足道。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重学院派抗战音乐、国统区抗战音乐，轻左翼抗战音乐、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的症结所在。显然，这种音乐历史观与中国近现代史学中的“告别革命”思潮有着内在的关联。应当承认，历史上的确存在救亡派的抗战音乐和学院派的抗战音乐，尽管救亡派与学院派这两个称谓在当时都是没有的。前者以聂耳为旗手，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左翼音乐文化；后者以黄自为领袖，作为一种以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为支撑的知识分子文化。尽管这两个不同流派的抗战音乐在表现形式、音乐风格、审美取向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但在救亡与启蒙这个问题上是具有一致性的；尽管左翼音乐家在如何救亡图存、如何启蒙大众的问题上发表了一些与学院派作曲家不同的观点，并对学院派音乐创作颇有微词甚至表现出批判态度，但在抗日救亡这个大义上并不存在分歧。救亡派与学院派之间更不会因为救亡与启蒙的冲突而分道扬镳。总之，无论是救亡派抗战音乐，还是学院派抗战音乐，其救亡和启蒙意识都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是选择了不同的形式和风格，诉诸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比如，在救亡派的抗战音乐中，救亡意识诉诸慷慨陈词、气宇轩昂的艺术表达，其启蒙则在于唤起民众的自觉意识和爱国热情；在学院派的抗战音乐中，救亡更多是一种爱国思乡情结，启蒙则更多是家国情怀，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或呈现为诗意般的心灵自由。故在浴血奋战的14年中，寓于抗战音乐的救亡和启蒙始终是绑在一起的，从来没有分开过。救亡派的抗战音乐如此，学院派的抗战音乐亦如此。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任何一场来自外敌的侵略战争都是一场灾难，但也是一次启蒙和洗礼，因为它能充分激发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并能让人们真正感到切肤之痛，进而获得民族觉醒。中华民族正是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觉醒。因此，抗战音乐的救亡作用不容忽视，但其启蒙意义也必须重估，左翼抗战音乐和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的启蒙意义更待重估。

# 为抗战历史增添文学注脚

■王昕朋 李昌鹏

谈艺观象

深度对话，解读现象

**李昌鹏**：2020年8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前夕，中国言实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中国抗战题材小说丛书。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策划出版这套丛书，作为社长，您有怎样的考量？

**王昕朋**：这套中国抗战题材小说丛书由9部长篇小说构成，包括骆烨的《游击英雄》、倪勤的《弯弯的永定河》、孟皋卿的《太行人家》、李克的《神槐树下》、刘俊杰的《卢沟桥抗战》、王克臣的《寒凝大地》、杨洪军的《疆场》、张润兰的《察哈尔英雄》，也包括杨沫的名作《青春之歌》。策划出版这套丛书主要是为了纪念。纪念英雄，旨在弘扬伟大民族精神，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让读者铭记历史。读者通过阅读抗战题材小说，会受到具体故事和情境的感染，在激荡的情感作用力下，于潜移默化中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积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现实力量。

**李昌鹏**：我注意到这套丛书，既包含有《青春之歌》这样的红色经典，更是推出了很多新人新作，有的作者可能并不为读者所熟悉，在择定入选篇目的时候，是基于什么样的标准？

**王昕朋**：中国抗战题材小说丛书收录的作品，既有像《青春之歌》这样的经典名著，也有像《游击英雄》这样的热播电视连续剧的同名小说原著。我想，红色经典与新人新作的并置会产生一种对话、碰撞、传承、融合的特殊效果。抗战题材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富矿，抗战题材小说一直是深受读者喜爱的，中国当代作家在抗战题材领域里也进行了长期探索与持续深耕，尽管现有的抗战题材小说可以说不胜枚举，但是可以挖掘和探索的空间依然十分广阔。这套丛书中的作者，虽然有的尚不为读者所熟悉，但都是非常具有创作实力和潜力的，有的作者对于抗战历史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和发现。经过严格甄选，我们为读者挑选出了艺术性、可读性兼备的长篇小说作品，将它们集体推出，也可以从某一侧面呈现出当下抗战题材小说创作的特点和新质。

**李昌鹏**：近些年，抗战题材的影视剧持续热播，有人觉得电视剧“分走了”抗战小说的“流量”，看电视剧的人远比看小说的人要多，因此，觉得抗战题材小说出版后的市场前景并不乐观，对此您怎么看？

**王昕朋**：你说的问题确实存在，但也不能用“零和思维”的观念去看待这种现象。抗战剧和抗战小说都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历史认知需求和文化审美需求，抗战剧的受众可以继续成为抗战小说的读者，抗战小说的受众也可以返身成为抗战剧的粉丝，二者之间应该是一种“正和博弈”的关系。这套丛书中也有像《游击英雄》这样的已经改编成电视剧的长篇小说作品，好的小说文本为电视剧生产提供了优质的母本，而电视剧的热播又会助推小说的阅读。

**李昌鹏**：某些粗制滥造的抗战剧被观众们称为“神剧”，吸引了众多观众眼球的同时，也极大地消解了抗战历史的真实性、严肃性，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这套中国抗战题材小说丛书秉承着严肃的历史观和真诚的创作态度，是否也有反拨“抗战神剧”这种不良创作倾向的考虑？

**王昕朋**：针对这种不良的倾向，我们确实进行了思考。现在对“抗战神剧”的批判和反思无论是对于艺术创作者还是受众，都达成了广泛共识，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将抗日战争游戏化、娱乐化、虚无化。对于这种背离历史真实的不良创作倾向的反拨和扭转也早已开始。事实上，抗战题材创作在中国有极为深厚的受众支撑，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对于真正优秀的抗战题材文学作品不仅是欢迎的，而且是渴求的。

抗日战争是全民参与的人民战争，这场战争的英雄，是我们的先辈。在中华大地上，曾经遍地英豪，因此积淀、留存在民间的抗战记忆是深厚而且丰富的。有些作品虽然艺术水准不高，但依旧可以吸引一定的受众关注，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伟大的抗战精神是流淌在人民群众的血脉之中的，这是问题积极的一面。但是，这也同时提示我们，切实提升抗战题材文学创作的水准是一个迫切而长期的任务。我们对这一历史进程的书写还远远谈不上充分，这也给当下的作家留下了广阔的施展空间。

我们出版这套中国抗战题材小说丛书的原则是面向市场，却并不唯市场论，我们始终秉持严谨的态度对待作品，尊重历史，尊重真相。像丛书中的《寒凝大地》，虽然是长篇小说，对历史事实做了艺术化的虚构处理，但作者所写的故事还是以真实的历史和生活为原型的，其中的史实还是经得起推敲的。

从文艺作品中可以看出创作者的立场和态度，可以看到历史和生活的影子，反过来说，通过受众的审美和趣味，也可以窥见一个民族的性格和精神质地。我们出版这套丛书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对抗战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需要，更长远一点来说，也是为了通过这种有灵魂、有质量、有温度的叙事，为我们民族整体历史观的建构，增添一种生动有力的文学注脚。

# 怀揣对历史和英雄的虔敬

■骆 烨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游击英雄》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作品，而且是影视剧和长篇小说同步推进的。因为之前充分的采访和案头工作为小说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所以创作的时候，还是比较顺利的。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长篇小说《游击英雄》入选中国言实出版社的“中国抗战题材小说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游击英雄》最早的故事核，是我的一个短篇小说《埋伏》，一万多字的篇幅，反映抗日战争中诸暨沦陷后，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抗战故事。一名叫武喜春的女游击队员救了受伤的国民党军营长李昌鹏，李昌鹏最后加入了浙东游击纵队，和诸暨人民在敌后战场上共同抗击日寇。武喜春是诸暨乡下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甚至还很自私，她只是想太太平平过她的小日子，但在乡亲们被杀戮，自己也差点遭受强暴的情况下终于奋起反抗。故事很简单，甚至都没有写到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戏，但这也是一个比较硬核的抗战故事。

我是浙江诸暨人。在我的阅读视野中，真实展现浙江地区抗战历史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写女游击队长的作品就更少。为此，我进行了细致的采访。

我始终相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在写每一部剧本或是小说作品前，我会先找来大量的相关资料阅读，然后开始实地走访，感受当时主人公生活和战斗的环境。创作《游击英雄》时，我先去了金萧支队的成立地——诸暨璜山镇黄家店村。时值严寒季节，又恰逢刚下过大雪，同行的朋友说看一下就行了，但我坚持要去山上走一走。山路虽然崎岖难行，却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创作素材。

黄家店村在大山的边缘，易守难攻，方便发展抗日斗争，所以金萧支队当年就看中并选择了这里作为成立地点。村里人见有外乡人来很是客气，一聊起金萧支队，村民还给我们介绍认识了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的黄友桂老人，他是金萧支队成立的见证人。在采访中，黄友桂给我们讲到了当年村子里的女英雄张香莲。张香莲是个寡妇，艰难地带着两个孩子生活，但是对游击队员们如亲人一般，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给队员吃，被游击队员亲切地称为“香莲妈妈”。金萧支队成立后，她的家也成为了抗日游击队的联络站，也因此被日寇抓去审问了3次。面对敌人的淫威，每一次她都是守口如瓶，宁死不屈，最后敌人也无奈地把她放了回来。还有一次，日军和伪军在扫荡时，游击队员们奋勇抵抗，16岁的游击队战士骆建忠负伤，张香莲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救下，随后藏在卧躺的水牛旁边，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在接受采访时，黄友桂老人还声音洪亮地唱起了：“枪支尖，枪支长，枪支挥舞发阳光。你在前面打，我在后面帮。军民团结，军民团结，牢牢团结起来把鬼子都赶光……”老人说，这首歌当年在他们这里是十分流行的。

真是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些实地采访来的素材后来都写入了长篇小说《游击英雄》中。真实的历史故事具有更加生动和感人的力量，也因此，在我后面创作的《老虎队》《双枪》等作品中，我也用大量的时间去采访那些经历过战争的当事人，去实地走访当年的战斗地。虽然，现如今大部分地方已经没有了当年战争的痕迹，但是如在黄家店村采访时一样，也会有意外的惊喜，激发起我创作的灵感。而且，就算是这一素材在当下写的作品中用不上，但在以后要写的作品中说不定就能用上。

写完《游击英雄》时，天气还很是炎热，我的心情也如夏日的温度一般热烈。诚如《壮士出川》《可爱的中国》剧中男主人公扮演者林江国在《游击英雄》一书的推荐语中写到的：“这本书反映的是在14年抗战中最普通的一群人的生存状态，我们不是在歌颂战争，而是在告诉世人，不管有多艰难，这个民族的魂都不会丢失。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不忘历史，警钟长鸣！”林江国在这部剧中也出演了男主人公李昌鹏。因为出演过众多军人形象，本身也具有一种硬汉的气质，所以他在这部剧中的表演很出色。无论是小说、剧本创作者、导演、演员还是这本书的出版者，大家都怀揣着对英雄、对历史的虔诚和敬畏。我想，这种对民族之魂和崇高精神的虔敬恰恰是作品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

黄河大合唱（油画） 刘宇一作

文艺评论

长征

第4968期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30分 印完4时50分